

# 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马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 北京 100006)

**摘 要:** 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 先前的研究已对此做出许多有价值的探讨, 但根据一些新出史料还可对这一事件最初策动过程略作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 不过他对当年的政治变化给予高度关注, 积极建言, 积极行动, 主动参与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行程的上海国会, 应该是合乎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郑观应; 东南互保; 上海国会

中图分类号: K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0)02-0083-06

1900年春夏之交所发生的东南互保, 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来龙去脉及其后果的研究, 前辈学者和时贤做过许多有创建意义的工作, 基本脉络大致清晰, 后果评估见仁见智。不过在对事件过程的研究表述中, 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到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张謇等人的决断、贡献和建言, 而对他们周边更多人物的研究还略嫌不够, 而郑观应就这样一个还不被充分重视的人。其实, 正是他们对外界动态的密切观察和及时建言, 才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 来自北方的启示

义和团运动在这一年春天达到高潮, 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采取强硬镇压手段, 义和团大规模从山东向直隶转移, 至1900年5月, 义和团民众遍布京津市面。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 义和团在虽然山东受到强力镇压, 可是在京津地区却受到清政府方面公开或非公开的保护、利用, 结果列强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他们以代清政府剿灭义和团的理由向中国出兵, 组成所谓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组建后, 一直寻找机会向北京进发, 理由是救援那里的各国公使及其眷属。然而遗憾的是, 八国联军在义和团的骚扰及清军有意阻止下, 根本无法达成目标, 他们瞻前顾后, 既要向前进攻, 突破清军的防线, 又要顾及后面, 担心来自山海关方面的援军。于是从联军的战略战术考虑, 占领控制清军的大沽炮台, 就成为联军行动的一个关键。

就联军出兵中国的目标说, 既然是“代剿”义和团, 那么联军与清军从理论上就是盟军, 联军向清军要求控制大沽炮台, 也不是没有理由。然而, 清军将领无法认同这个盟军,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和平交出至关重要的大沽炮台。

和平手段无法获取, 联军径直以军事手段解决。6月16日凌晨, 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总攻,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 联军夺取了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失守是1900年中外关系的转折点, 原本勉强认同列强出兵中国的清政府终于翻脸, 几经犹豫, 清政府于6月21日下诏宣战。清政府以一国之力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十一个国家较劲, 十一国与中国立即处于战时状态。

收稿日期: 2009-09-16

作者简介: 马勇(1956-)男, 安徽濉溪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易惠莉教授在《郑观应评传》中指出, 郑观应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令他涉足策动东南互保这样高层的政治外交活动, 他在盛宣怀亲信行列中主要发挥的是经济方面的作用, 而非政治领域。见《郑观应评传》, 590-591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个评估大致不错, 只是郑观应在此期间的活动及其后果, 还值得检讨和评估。

既然处于战争状态,联军不仅毫不客气地占领了天津,而且向周边用兵,向北京进攻。在向周边用兵的过程中,中国先前创办的许多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联军甚至根据现代战争的惯例,将自己所控制区域对方资产予以没收。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和天津周边地区一些属于中国政府或中国人的重要资产循 1894 年和 1884 年两次战争中的惯例,将这些产业临时置于外国国旗的保护之下,就是采取了在各有关国家领事馆对真实的卖契予以注册的办法<sup>[1]68</sup>。

这种办法当然也留有许多后遗症,比如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开滦煤矿矿权纠纷,就是弄假成真,智慧确实不太高的中方主事者张翼在匆忙中被国际小人蒙骗。开滦煤矿矿权纠纷不仅长期困扰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而且国际兴讼<sup>[2]</sup>,旷日持久,中国方面蒙受了巨大损失。

开滦煤矿矿权纠纷的发生说到底是中国方面主事者张翼在八国联军占领开滦煤矿资产后乱了手脚,匆忙决策,轻信洋员德瑾琳的结果,张翼如果不是被联军扣留关押,估计也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漏洞,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开滦煤矿全部资产以一纸手写文书交给一个外国人保管,以为如此可以避开联军的侵占蹂躏,谁知是将开滦煤矿交给了一个类似于国际诈骗的团伙<sup>[3]138</sup>。

其实,开滦煤矿矿权纠纷和中国方面的巨大损失,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在过去几十年间遇到中外重大冲突和战争状态,已经几次使用过这种托管的办法,而这种托管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保全了中国方面的资产,应该说是危急状态中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应该因为具有某种可能的风险而不为,关键是要做的周密和符合程序。

不知道北方的经验还是过去的经验启发了郑观应,郑观应在上海局势日趋危险,联军有可能在上海登陆,而义和团民众也有可能大规模向南方发展的情势下,向他的主管上司盛宣怀提出了寻找可靠的外国势力托管中国资产的建议。

6月22日,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对天津外国租界的进攻和北方战局的进展必将对南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中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随着形势的演变,英国军队极有可能在上海登陆,进而占据吴淞炮台,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进行惊扰。

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他建议盛宣怀,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公司宜早筹备,将资产安全转移至外国名下,这样或许有利于保护。

根据郑观应的说法,他的这个建议当天已与徐润商量过,徐润所属各公司“亦拟换旗”,并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换,有的认为不必换,有的认为还可以等待局势的变化,宜缓换。总而言之,意见不一。所以他在这封信中请盛宣怀予以裁示<sup>[4]80-81</sup>。

郑观应此时任职轮船招商局,并在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吉林矿务公司等兼职,而这些工厂或公司都是清政府的产业,至少也是以政府产业为主导的股份企业,归盛宣怀主管或主办。他此时之所以对北方特别是天津的局势格外关心,除了工作方面的原因外,还与其五弟郑翼之等亲人均在天津博文书院读过书等缘故。

至于与郑观应商量换旗保护产业的徐润,也是广东香山人,与郑观应为小老乡。徐润字雨之,别号愚斋,与同乡郑观应一样,也是当年上海滩大名鼎鼎由买办而华丽转身的红顶商人,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会同唐廷枢接办李鸿章创建的轮船招商局。后又接手平泉、鸡笼、开平、贵池等矿务。此时也归属盛宣怀管理,是盛宣怀所倚重的洋务人才。

郑观应、徐润与盛宣怀之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和比较复杂的个人关系,郑观应的这个建议我们从已有文献还看不出盛宣怀有什么回应,只是可以肯定的是,郑观应的这个提醒一定启发了盛宣怀,三天后即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议“从权”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sup>[5]</sup>随电附有草拟的互保章程草稿。

盛宣怀的建议应该说与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力任保护、稳住各国、暂保长江的思路一致,因此他的建议很快在刘坤一那里获得积极的回应。6月25日,刘坤一复电盛宣怀,表示赞成盛宣怀的建议<sup>[6]679</sup>。同一天(6月25日),刘坤一又致电盛宣怀,请盛宣怀就近指导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团进行谈判,以便早日定议<sup>[7]86</sup>。

东南互保的建议特别是刘坤一的坚定态度立即

获得东南各省督抚的积极回应，他们普遍相信盛宣怀的判断：“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朝廷）廿四日旨。”他们相信东南互保不仅是克服目前时局危机的惟一办法，而且也合乎朝廷先前要求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指示精神<sup>[9]954</sup>。

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训令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讨论局势。余联沅在会议上要求领事们致电各自政府，建议除了现在正在进行战斗的北方地区外，宣布中国其他地区为中立区。余联沅奉命表示，如果各国政府照此办理，那么中国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就有足够的力量保证维护秩序<sup>[9]523</sup>。经过周密谈判，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签署《东南互保章程》共9条。

东南互保达成后，郑观应将中国企业易帜的建议自然不了了之，不过可以相信的是，他的这些建议对于促成东南互保的形成应该有一种隐性的力量在。

### 时局的关键

东南互保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也是当时东南经济发达地区行政当局和一般民众的共同期待，并不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奇思妙想一厢情愿。所以郑观应的建议也只是社会共同意识中的一个浪花一个潜流，是历史合力中的一个微小的力量而已。

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郑观应无疑是赞成东南经济发达地区暂时脱离中国政府的管制，与列强达成共管的协议，既可避免联军转舵南下，惊扰东南，也可防止义和团民众在联军和清军的驱赶下向东南流窜。应该说，这是在北方大局糜烂之后所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保境安民是东南互保的核心，但东南互保绝不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如果东南督抚满足于东南互保的达成，偏安一隅，那么时局不仅不能好转，反而会因此持续恶化。所以，在保持东南半壁江山不受内外力量的破坏前提下，用什么样的办法，从哪个地方突

破，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问题。

一般说来，当时上海如郑观应、盛宣怀这样一批与外国人交道密切、关系千丝万缕的洋务、买办阶层，在感情上一点都不同情义和团，他们始终如一痛恨义和团的骚扰破坏，痛恨清政府中一大批愚昧官僚出于非常自私而见不得人的狭隘考虑，利用义和团，宣扬愚昧的爱国主义排外情绪。

按照郑观应的看法，清政府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初的应对就错了。因为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义和团合法化扩大化，从来的秘密结社都是政府防不胜防的最大隐患，即便他们的主旨是对着外国人和外国势力，但弄到最后一定是政府的敌人。可悲的是，清政府中有一大批枢臣竟然相信义和团偶有灵验的符咒，相信义和团是中国抵抗列强侵略的主要力量，于是义和团民众先是烧教堂，杀教士，继则围攻公使馆，杀公使，震动五大洲，引起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各大国公开出兵干预<sup>[10]</sup>。现在形势已不可收拾，为了扭转中国持续被动的局面，郑观应、盛宣怀等人一致认为应该注意保护各国公使的绝对安全，绝对不能再出现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这样的恶性事件，同时注意寻找机会，寻找最安全的道路、方式，恭送各国公使和他们的眷属出京，为扭转时局，重开和谈准备条件。

保护各国公使和所有外国人的安全，是盛宣怀和东南督抚最为关心的问题，两国交兵不杀使者，这是中国两千年前就提出的交往原则，所以稍具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也认为这是最低的外交原则，至于那些与外国人有密切往来的洋务人才、红顶买办，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在那些最紧张的日子里，郑观应似乎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北方事态发展，注意向盛宣怀或通过盛宣怀向清政府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6月19日，上海各方面纷纷传言总税务司赫德被枪杀，郑观应很快判断这个消息并不确切，他在当天致函盛宣怀谈了自己对这个传言的看法，但他同时强调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伤害各国大员等情，否则将来很难收束<sup>[11]72</sup>。

遗憾的是，郑观应的判断刚刚表达，第二天在北

当北方局势越来越坏时，特别是清政府大规模改组，庆亲王奕劻等人出局，端王等人入主总理衙门之后，南方许多官僚就判定慈禧太后必将西幸，南方只能寻求自保，寻求与列强合作而不是对立。而这一点也正是西方国家外交官当时追求的目标，列强也不想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开战。6月15日，英国政府决定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合作，全力支持他们在长江流域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16日夜，郑孝胥在与张之洞聚餐时，也当面建议张之洞力保汉口，“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所以说，东南互保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实是形势使然。参见《郑孝胥日记》（2），760页。



京就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枪杀的恶性事件。舆论哗然,举世震动。6月26日,郑观应根据自己与美国驻沪总领事的直接交谈,获悉各国已陆续向天津集结,进攻北京,救援各国公使必不可免,于是他在当天中午立即致函盛宣怀通报了这种情况,介绍西报传言清军保护各国公使出京,惟不知现在何处,令人焦虑。他建议清政府采取绝对安全措施保护各国公使,不要再节外生枝,为将来的外交谈判设置新的困难<sup>[12]389</sup>。

### 根本解决

充分保证各国公使及其眷属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能再发生克林德被无端杀害那样的恶性事故,这当然是解决时局困境的关键,但显然不是时局根本转变,不是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解决,当然也不是郑观应在1900年思考的重点。

事实上,在这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郑观应延续着先前数十年的思考,期待中国怎样利用这些非常变局走出一条新路,怎样从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郑观应在《拳匪》最后说:“北望泪沾巾,烽烟何日止,车驾盼东还,新政从此始。”前两句显然是在强调怎样解决时局危机,尽早终止北方的战争,不论是与义和团,还是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两句当然是期待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那就是希望尽早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政治危机,化危为机,不要再玩1898年或之前的政治游戏,两宫尽早结束“西狩”,返回北京,开始真正的政治变革<sup>[13]1364</sup>。

商人、洋务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并非一般的商人,或许是因为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机缘,使他和同时代的洋务人才、买办大班就是不一样,他寄身于买办阶层,但似乎并没有沉溺于灯红酒绿,贪婪于金银财富,他忧国忧时,不满于社会现实,不满于政治现状,他对西方近代富强之路、大国复兴的历史与根源有着充分的理解和研究,总是期待自己的祖国也能像西方大国一样,实现复兴,重建辉煌。郑观应具有那个时代少有的忧患意识和普世理想,当整个社会沉湎于同治中兴、洋务新政那短暂的经济增长成就,陶醉于大清王朝重建盛世不可一世的时候,郑观应的头脑似乎格外冷静,他继早期作品《救时揭要》之后,又于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相继出版《易言》和《盛世危言》两部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重要著作。这两部著作奠定了郑观应思想异端的基本风格,使他虽

然身在体制内,但总想着这个体制随时都有分崩离析、大厦将倾的危机感。所以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体制内乌鸦嘴的政治风险,在举世陶醉于“盛世”的梦幻中,大声棒喝,唱起了反调,警告国人不要做井底之蛙,不要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屏蔽,还是要睁眼看世界,冷静看待中国与世界在总体上还有很大差距,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需要改革。

在《易言》中,郑观应提出一系列改革内政的措施,主张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同步,主张国民待遇,中国民间资本与外国资本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更重要的是,郑观应在《易言》中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以为这才是西方富强稳定可持续的根本制度,中国只有像西方一样,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为中国未来提供一个持久发展和与世界同步的道路。

郑观应的议会政治思想在1870年代无疑显得离奇超前和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致相信“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为中国先前几十年之所以被西方大国任意羞辱任意宰割,其实主要的是中国在经济上国防上不如人,所以中国人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于谋发展,只要中国强大了富有了,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强大了,中国就可以享有高兴或不高兴的权力,就可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就可以将受屈辱的历史彻底抛弃。

这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深深误导了中国几十年,中国在那几十年虽然换来了国内政治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代价却是中国在政治上止步不前,错过了政治与经济的同步发展,错过了国内关系的重新调整,也错过了中国人接受普世价值与世界同步的良机。特别重要的是,当中体西用成为国人共识,经济发展成为一种绝对任务时,这就为后来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埋下了巨大的障碍,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晚清二十年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巨大阻力。

《易言》中的政治变革思想没有被那个时代所接受,这当然使郑观应感到伤心感到失望,不过他不满足于就此放弃,更没有改变信念,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认知,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易言》发表之后的若干年里,尽管命运坎坷,内外交困,事业到了谷底,父兄妻子怨于内,上司朋友责于外,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用全副精力重写《易言》,至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完成。

《盛世危言》所表达的政治理念没有从《易言》后

退,反而向前迈出一大步,将在《易言》中还处于犹豫不定的君主立宪政治理念清晰化,以为君主立宪政体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案,大清王朝要想坦然面对中外压力,就要化压力为动力,迅速实行君主立宪。至于与君主立宪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郑观应也有详细的研究和设计,以为至少要在舆论传播与控制,官员选拔与罢免,教育制度的改造与重建等方面下大力气花大功夫。

与《救时揭要》、《易言》的结局很不一样。《盛世危言》生逢其时,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使国内终于有了一个接受《盛世危言》特别是其政治变革建议的外在环境,从光绪帝至各级文武大员,都对这部书发生了兴趣,即便不知道这部书的下级官吏,也开始知道要维新要变革,于是在1895年之后的那几年,中国实在是进入一个维新时代,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走上政治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可能性大大增加,郑观应在那几年也一扫先前的晦气,重出江湖,成为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麾下很重要的红顶商人,参与近代中国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然而,一个充满希望的维新时代终于因1898年秋天的政治事件而发生逆转,中国政治几乎重新回到甲午战前的起点上,紧接着又发生震动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引发列强直接出兵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东南督抚出于各方面的实际考虑,与列强联合达成东南互保的权益之计,但是要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靠东南互保这种经济上的互惠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寻找到一条新路。于是在那短短的几个月,东南督抚、政府要员,在朝在野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乃至那些并非热衷于政治的商人,都在利用清廷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困境而寻找机会,甚至寻找替代清廷的政治方案,张之洞、李鸿章分别与唐才常、孙中山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与合作,希望能够在政治上为中国开出新局面,而在上海,在刘坤一的地盘,先是有元善等1231人合词电禀,请求光绪帝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反对清廷所谓废立阴谋<sup>[14]309</sup>;后有中国议会的成立与发布。这一系列行动,如果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就能看到其前后逻辑关联,也能看到与郑观应思想主张的因果关系,也就知道郑观应列名中国议会正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和难得的一次实践。

由于中国议会存在的时间太短,而后政治局面完全改变,中国议会的相关资料相对散失,郑观应与中国议会的关系若隐若现,并不明朗。只是从其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看,他参与中国议会,应该是其思想的自觉和必然结果。他大概确实希望中国议会能够与东南互保相互声援,尊崇光绪帝,树立皇权中心,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实行新政,不承认端王、刚毅等所谓伪政府。

1900年7月26日(七月初一日),中国议会成立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召开,海上同志80余人出席,大家以次列坐北向,叶瀚充会议主席。叶瀚曾长时期充任张之洞幕僚和属员,1895年在上海与汪康年一起创办《蒙学报》,为维新运动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或许是在湖北张之洞手下从事自强事业时,郑观应就与其结识,成为朋友<sup>[15]2540</sup>。

在当天的会议上,叶瀚宣读中国议会的宗旨共五条,一是不认通匪矫诏的伪政府;二是联络外交;三是平内乱;四是保全中国自主;五是推广支那未来的文明进化。会议以举手的方式通过这个宗旨宣言,然后举行正副会长选举投票。容闳、严复被分别票选为正副会长。容闳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声如洪钟,振奋人心,掌声雷动。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三天后(29日),中国议会诸同志在愚园举行第二次会议,到会者60多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观应被容闳指定为10名干事者之一,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并列,这显然是看重郑观应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中国议会内部派系林立,结构复杂,各人想着各人的主意,容闳虽为公举的会长,但他并不知道中国议会的核心成员唐才常自立会准备举事的内幕,至于其间与帝党有特殊关系的文廷士,与张之洞有师生情谊的叶瀚,与李鸿章交情甚深的狄葆贤等人,其实都是在利用中国议会这个平台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与日本幕府末期尊王攘夷的情形根本不同。这就引起章太炎的愤怒,以为一面勤王,一面排满,既不愿承认满清政府,却又要拥护光绪帝,这个无法化解的内在冲突终于使章太炎等人从改良主义走向革命<sup>[16]77</sup>。所以,中国议会不过是一批略具新思想的乌合之众,即便后来不被清政府镇压,这个离心离德的政治联盟也必将很快结束蜜月,走向解体。

这是中国议会参加者章太炎的看法,他在当年写给夏曾佑的一封信中分析了中国议会各派系的政治倾向,表示“志士既少,离心复甚”,前途不容乐观。见《章太炎书信集》,5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国议会折腾了不到一个月,北方的局面就因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两宫“西狩”而大致趋于稳定,东南督抚见风转舵,一切与清廷离心离德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一律停止,原本期待出兵期望重建政治权力中心的唐才常失去利用价值,遂于 8 月 22 日在汉口被逮捕并立即处死。消息传来,中国议会自然就是非法组织,无须任何机构下令,也就自行终止。

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和结果,我们感到尽管郑观应应该是中国议会中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但是他在后来的岁月中似乎并不太愿意重提这段政治经历,致使这一过程的复原与重建几乎不可能。

[责任编辑 乔林晓]

#### 参考文献:

- [1]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 [2]严复.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矿事书[N].《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 [3]代张翼草奏[A].严复集(1)[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A].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B].
- [5]盛宣怀.寄李中堂、刘岷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A].愚斋存稿(36)[M].
- [6]刘岷帅来电(五月二十九日)[A].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 [7]刘坤一致盛宣怀电(1900年6月25日)[A].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B].
- [8]盛京堂来电并致南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A].李鸿章全集(3)[M].
- [9]代总领事华仑致萨利斯布里侯爵电(1900年6月27日)[A].义和团(3)[Z].
- [10]拳匪[A].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11]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900年6月19日)[A].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B].
- [12]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900年6月26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B].
- [13]郑观应集(下)[M].
- [14]上总署转奏电禀[A].虞和平.经元善集[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15]叶瀚致汪康年书(12)[A].汪康年师友书札(3)[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冯自由.革命遗史(2)[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Zheng Guanying in the DNHB Period

MA Yong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Dong Nan Hu Ba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modern China. There are already so many valuable researches, so this paper just probes into initial stage of this incident. Zheng Guanying was not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event. As a resul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his suggestions were effective or not. He, however,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he acted in positive way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hanghai Congress. These actions should be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is logical thoughts.

Key words : Zheng Guanying; Dong Nan Hu Bao; Shanghai Congress

张之洞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自立军史料集》,17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一文中表示,由于中国国会参与者多为诵读诗书多才能文讲求时务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中国国会存在期间发表过一些荒唐言论,但其用心显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同,大率本非康党,所以既往不咎,允其改过自新。张之洞竭力避免清查扩大化,可能有许多复杂的考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国会参与者许多人与其关系密切,或幕僚或门生,甚至中国国会存在过程中,张之洞也清楚这其中的一切。